



马相伯



赵元任



何炳棣

◀ (上接10版)

经扮演了进步的角色,发展教育,推动了哲学、神学与科学的发展。但有的时代它也是保守的,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天主教会代表了怀疑进步思想的力量。他们禁书,抵制新思想。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时期,它既有保守性,也有进步性。比如耶稣会传教是西方与全球的互动,他们做出了一些先进的贡献,把非西方的文化引到西方去。但它在欧洲也有保守的一面,比如对科学、思想、印刷、传播的严格控制等。这也是科学革命在新教国家发展比较快的原因。

欧洲史的研究基础让我对欧洲历史文化背景比较有把握。在中国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的长处是能够掌握中国史料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可是对传到中国的西方文化本身的历史背景则不见得那么了解。举个例子,我为什么要从意大利开始写利玛窦的传记,就是因为我想把利玛窦所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清楚地表达出来。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汇报:您的《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披露了外文文献中的利玛窦,展现了晚明不为人知的一面。利玛窦“以儒释耶”的方式引起了争议,却为他个人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为耶稣会在晚明中国的活动打开了局面。利玛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后来没有出现第二个利玛窦?

夏伯嘉:第一,利玛窦是一个天才。第二,他所处的年代跟晚清也非常不一样。利玛窦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化比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更加辉煌,中国人不是多神信仰、迷信的民族。可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后来成为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

文化与民族国家之间不能划等号。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欧美的白人来到世界各地,都带有种族优越感,那时基督教也已经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一种符号。在他们看来,西方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全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督教文化本身的优越。明代传教士基本上不会觉得基督教的优越是因为白种人的优越,他们大部分是能够将民族与宗教分开的。

利玛窦觉得中国人很聪明,也非常欣赏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他觉得科举制度能够让中国把最聪明的孩子引到国家精英的位置,可以让最有才智的人去统治这个国家。科举制度虽然在今天饱受诟病,但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公平的制度。相较而言,欧洲的贵族社会是通过血统来继承财产与社会地位的,当时欧洲也没有一个像中国科举制度那样面对社会大部分人的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唯一一个相似的制度就是通过教会来选拔人才,其中耶稣会在其中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这一制度也不是遍及全欧洲的。

利玛窦成功的关键是对中国文化的尊敬。他真心佩服中国文化,这也是他多年努力学习中国文化的结果。在异文化中,要受到人家尊敬,你也一定要展示出对人家的尊敬,对别人文化的认识。他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对中国的文化下了很深的功夫。利玛窦自从踏上中国国土之后,就没有想过要回到意大利去,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成为了中国文人。他诚心接受了许多儒家文化因素,特别是在道德伦理、待人接物方面。他的成功在于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国读书人,尊重儒家礼仪文化,对中国人彬彬有礼。社会伦理方面的儒家思想对他也是有深远影响的。

耶稣会后来也培养过中国神父,18世纪的时候他们也挑

选了一些中国的年轻人送到法国去,让他们从头到尾接受整体的西方训练,用拉丁文、法语来学习。可是这批人回到中国以后却没有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因为他们去国外的时候还比较年轻,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子。当然也有例外,徐光启、李之藻在翻译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还有马相伯兄弟,可是这要到19世纪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具备深厚国学功底的中国文化人很难同时对西方也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要求他们学贯中西,作出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贡献。我想在那个环境里面是不可能的。

文汇报:明清来华的西方人有外交使节、商人与传教士等。如何在世界史的视野中看待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

夏伯嘉:外交使节和商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没有时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像在澳门通商的葡萄牙人,通常去广州一个月就要离开,他们跟中国人的互动都需要借助翻译。外交使节在中国也不能够停留太久,所以他们通常请传教士做翻译,他们和商人一样都不能长期在中国生活。

明清时期能够长时间留在中国,深入学习中国文化的只有传教士。独立的汉学家出现得很晚,可能要到19、20世纪了。晚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人数其实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人,利玛窦是先驱。比较能够承继他的传统是意大利教士艾儒略,可是他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福建省。因为那时明末农民军起义,北方与南方的交通与通信已经中断,北方在农民军的手里,所以北京的耶稣会士也不能与南方的耶稣会士通信。

除了耶稣会以外,明清之际来华的还有方济各会与奥古斯丁会的传教士。他们绝大部分是西班牙人,从西班牙到中南美洲再到菲律宾、中国。他们

的经验与路线跟耶稣会是不一样的,因为西班牙是通过征服与殖民把基督教带到中南美洲的。他们在中南美洲的文化政策是打击、镇压与消灭本地民族的宗教与文化信仰,他们到了中国之后也执行这一套文化政策。只有少数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大部分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不值得学习,认为那也是迷信的一部分。他们在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与福建部分地区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可是这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他们在闽南一些大宗族与小宗族、社会与经济的矛盾中引起了某些宗族对天主教的兴趣。对他们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活动的区域相对较小,主要在闽南和广东;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情感方面可能还是比较欣赏耶稣会,因为与中国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所以在分析明清传教士的时候还是要区分他们的差会。明末清初还比较简单,因为耶稣会还是主体。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就越来越复杂,差会本身的矛盾最后甚至导致了礼仪之争和百年禁教,成为了中国传教史上一个很大的分水岭。

19世纪开始有新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新教教义认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传教了,福音在那时已经传播到全世界去,所以他们刚开始并没有把传教作为主要任务。新教开始在海外传教得益于海外通商。在1700年以前,在亚洲势力最大的欧洲国家是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帝国在1700年以后开始衰落,他们在亚洲的地位相继被荷兰、英法等国取代。17—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发展与此紧密相关:荷兰在17世纪开始替代葡萄牙人在亚洲

的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支持新教传教士的海外传教,他们投入的资本与人力并没有天主教会多,因为他们主要还是一个贸易公司,以赚钱为主。新教的贡献有把《圣经》翻译成马来文,以及创制台湾地区高山族的书写语言等。18世纪后期英国作为一个全球商业帝国的兴起,带动了新教的蓬勃发展。法国也是一个强大的海上帝国,支持天主教传教。所以后来中国的天主教事业从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的手里转到了以法国人为主的传教士手里,这跟法国国力、帝国殖民地的海外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从欧洲认识中国

文汇报:18世纪欧洲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热?

夏伯嘉:欧洲出现中国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瓷器的出口。瓷器在明代已经开始大量出口,葡萄牙人把瓷器经印度运输到欧洲去,后来荷兰与英国人的直接通商也是源于出口中国瓷器。欧洲甚至出现了模仿中国瓷器的技术。这是中国热兴起的艺术因素。

第二点与耶稣会有直接的关系。1678年,巴黎出版了拉丁文版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没有翻译,因为篇幅太长了。这是“四书”第一次在欧洲出版,在欧洲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也是欧洲汉学的奠基性著作。“四书”的翻译凝聚了几代耶稣会士的心血,利玛窦就参与过“四书”的翻

(下转12版) ▶



欧洲出现中国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瓷器的出口。瓷器在明代已经开始大量出口,葡萄牙人把瓷器经印度运输到欧洲去,后来荷兰与英国人的直接通商也是源于出口中国瓷器。图为万历崇祯时期外销的克拉克瓷,瓶身可见开光花纹